

关于节气、天文历法等知识,向来为权力、少数人垄断。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知道时间,懂得天时、农时,子时午时及其意义的人并不多。直到民国年间,“教育部中央观象台”还要每年制订历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挂历、台历等市场化力量打破了权力的垄断。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问时、调时、定时了。

我们的知识史带来的负面作用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对很多现象、习俗,知识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有而不知其万有。节气,这一传统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生活和文明现象,不仅民众日用而不知,就是才子学者也少知道其功能意义。

时空并非均匀。一旦时分两仪四象,如春夏秋冬,我们必然知道自己在春天生发,走出户外,在冬天宅藏,在秋天收敛,在夏天成长。

在传统社会那样一个以农立国的时代,时间远非生长收藏那样简单,更非王公贵族、精英大人、游手好闲者那样“优游卒岁”。先民在劳作中,渐渐明白时间的重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传统农民没有时间观念,尤其没有现代的时间意识,但他们不仅随着四季的歌喉作息,而且分辨得出一年中七十二种以上的物候迁移。“我看见好的雨落在秧田里,我就赞美,看见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这样的诗不是农民的。农民对自然、鸟兽虫鱼有着天然的一体缘分感,如东风、温风、凉风、天寒地冻、雷电虹霓;如草木、群鸟、桃树、桐树、桑树、菊花、苔菜;如鸿雁、燕子、喜鹊、野鸡、老虎、豺狼、寒号鸟、布谷鸟、伯劳鸟、反舌鸟、苍鹰、萤火虫、蟋蟀、螳螂、鹿、蝉等等,农民是其中的一员。

农民明白粗放与精细劳动之间的区别,明白农作物有收成多少之别,播种也并非简单地栽下,而分选种、育种和栽种等步骤。农民中国的意义在今天仍难完全为人理解,中国农民参与生成了对人类农业影响极为深远的水稻土。一亩小麦可以承载的人口是多少呢?25人左右。一亩玉米可以承载的人口大概是50人。一亩水稻可以承载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继承大统。”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

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于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

【灯下碎语】

在节气时间中认知自我 余世存解读二十四节气:



的人口则是200人左右。在农民这个职业上,中国(包括东亚)农民做到了极致。一个英国农学家在19世纪初写的调查报告中认为,东方农民对土地的利用达到艺术级,一英亩土地可以养活比在英国多六倍的人口,从套种、燃料、食物利用、施肥循环、土壤保护,都非常了不起……所有这些都与农民对时间的认知精细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农民借助于节气,将一年定格到耕种、施肥、灌溉、收割等等农作物生长收藏的循环体系之中,将时间和生产生活定格到人与天道相印相应乃至合一的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生产生活有时,人生社会有节,人身人性有气,节气不仅自成时间坐标,也演化成气节,提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为。孔子像农民那样观察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为此引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从节气到气节,仍是今天人们生存的重要问题:我们是否把握了时间的节气?我们是否把握了人生的节点?是否在回望来路时无愧于自己守住了天地人生的气节?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跟天地自然隔绝了,当代人为社会、技术一类的事物裹挟,对生物世界、天时地利等等失去了感觉,几乎无知于道法自然的本质,从而也多失去先人那样的精神,更不用说气节。

但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天地时空的感受是细腻的。时间从农民那里转移,抽象升华,为圣贤才士深究研思,既是获得人生社会幸福的源泉,也是获得意义的源泉。时间有得时、顺时、逆时、失时之别,人需要顺时、得时,也可以逆时而动,但不能失时。先哲们一旦理解了时间的多维类型,他们对时间的认知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读先哲书,处处可见他们对天人相印的感叹:“豫之时义大矣哉!”“随之时义大矣哉!”“遁

之时义大矣哉!”这就是顺时。“革之时大矣哉!”“解之时大矣哉!”“颐之时大矣哉!”这就是得时。

一个太阳周期若分为春夏秋冬四象,一年就有四象时空,如分成八卦八节,一年就有八种时空,我们能够理解,太极生分得越细,每一时空的功能就越具体,意义越明确。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不仅与农民有关,也与城里人有关,更与精英大人有关的原因。在二十四维时间里,每一维时间都对其中的生命和人提出了要求。一个人了解太阳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来,就知道此时北半球的生命一阳来复,不能任意妄为,“出入无疾”;一个人深入体悟这一时空的逻辑,就明白天地之心的深长意味。而我们如果了解到雨水来临,就知道农民和生物界不仅“遇雨则吉”,而且都在思患预防。我们了解到大暑期间河水井水浑浊,天热防暑,需要有人有公益心,此一时空要义不仅在于消暑,和获得降温纳凉防暑一类的物资,更在于提高公共认同,“劳民劝相”。二十四节气时间,每一时间都是人的行动指南,冬至来临,君子以见天地之心;雨水来临,君子以思患预防;大暑来临,君子以劳民劝相。

节气不仅跟农民农业有关,不仅跟养生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对生命、自然、人生宇宙的感受、认知有关。普通人只有了解节气的诸多含义,他才能理解天人关系,才能提升自己在人生百年中的地位。在小寒节气时需要经纶意识,在大寒节气时需要修省自己,在立秋时需要有谋划意识,在秋分时理解遁世无门……古人把五天称为微,把十五天称为著,五天多又称为一候,十五天则是一节气,见微知著,跟观候知节一样,是先民立身处世的生活,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参照。我意识到,时空的本质一直在那里,只不过,历史故事也好,诗人的才思也好,只是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们,来强化它们。有些时空的本质仍需要我们不断地温故知新。

(节选自《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序言,配图为老树绘)

【书中风云】

掌校时间最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五四”运动之后的 北大学子

蔡(元培)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生活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说成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波。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波,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摘自《西潮》,蒋梦麟著)

【阅案所得】

洋医生见证九王夺嫡 谁是康熙钦点的接班人

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辞世。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

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等均有来往。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

博
Do you